

胡学文 —— 辑

徽州宗族研究译文集

復旦大學出版社



徽州宗族研究译文集

胡学文——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州宗族研究译文集/胡学文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9
ISBN 978-7-309-13028-7

I. 徽… II. 胡… III. 宗族-研究-徽州地区-文集 IV. K8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6834 号

徽州宗族研究译文集

胡学文 辑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52 千

201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028-7/K · 615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徽学是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区域研究”，其核心是明清以来徽州的社会经济史，是研究徽州社会、徽商以及徽商在全国各地活动产生的相关问题的一门学问（王振忠语）。伴随徽州土地买卖、租佃字据、宗谱族谱、公文案牍、诉讼文书、书信手札、乡规民约、赋役黄册、徽商账本、遗嘱阉书等原始文书的大发现，徽学逐渐成为受学者重点关注的一门显学，成为继敦煌学、西藏学之后国内第三大地方学。徽州地方经济社会史不单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学者的研究兴趣，同时也走出国门，受到国外研究者尤其是日韩和美欧社会经济史学者的青睐。尽管国内一直有学者（如刘森、傅衣凌、黄宗焕、叶显恩、唐力行、王振忠等）引进、译介海外徽学研究成果，但无论从数量和类别上来说，这一工作仍有继续下去的必要。2014年12月，我们承担安徽大学徽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心的招标课题“海外徽学研究信息的收集与整理”。以此课题为依托，我们决定译介一批近期海外的徽学研究成果，是为这本《徽州宗族研究译文集》之缘起。同时本项目也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徽学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海外徽学研究译丛及研究”（项目号：13JJD770001）的资助。

在徽学相关研究领域中，宗族问题始终是焦点之一。与宗族问



题相关的宗族祭祀、族产经营与分配、佃仆制、棚民问题、土地关系及赋役制度等从多方面反映了徽州社会经济史的变迁和演化。因此，我们决定从大量海外徽学研究成果中选取一些集中于徽州宗族及相关问题研究的论著进行译介。论著的选择既要考虑到学术质量及影响力，同时研究者的国别属性也应该具有代表性。基于这种考虑，我们选取的论著出自三国学者，即美国学者、日本学者和韩国学者各2篇。所选论著皆围绕一个主题，即徽州的宗族及相关问题。

对这6篇论文，我们组织从事英语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李峤、从事日语教学与研究的学者王永东、从事韩语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宋文静分别着手译成汉语。其分别承担的翻译工作如下：

李峤译郭琦涛《家族地位与民间祭拜：程敏政和明代中期徽州宗族政治》、杜勇涛《跨地域宗族与故土情怀：以清代苏州潘氏为例》；

王永东译铃木博之《清代徽州府的宗族和村落——歙县的江村》；

顾盼译中岛乐章《清代徽州的山林经营、纷争、宗族形成——祁门凌氏文书的研究》；

宋文静译洪性鸩《清代徽州宗族与保甲制的展开》、金仙德《明代徽州宗族制的发展与诉讼现象》。

译稿初成后，由于不同国家原著者的语言风格和学术表达存在较大差异，胡学文对全稿进行统一校译，使其尽量做到风格大体一致。

在文集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包括原作者在内的许多人的帮助。安徽大学历史系周晓光教授和王开队博士为我们的选文提出很好的指导意见。在翻译郭琦涛、杜勇涛和铃木博之的论文时，安徽大学图书馆徽学专家孟凡胜博士为我们查证引文文献并修改译稿。郭琦涛教授将其自译稿发给我们供参考。杜勇涛教授亲自润色、修改其论文的译稿。在我们联系中岛乐章教授来获取授权时，他告知我

们台湾学者顾盼教授已经翻译过该文,并主动联系顾盼教授为我们提供他的译文。经过和原著者商讨并经顾盼教授同意,我们决定在表述方面作适当修改后选用顾译收入文集。安徽大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徽学研究中心的刘伯山教授为我们提供韩国学者的联系方式,使得我们得以联系上韩国的两位学者。复旦大学出版社史立丽编辑自始至终关心这本集子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利用这个机会,译文集编译者谨向上述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关心、帮助与指导,这本译文集将无法成书。

由于译校者均不是徽学、史学方面的专业人士,译文集中差误和不准确的地方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使我们的后续徽学译介质量能有所提高。

胡学文

2017年3月



目 录

前言	1
郭琦涛 家族地位与民间祭拜:程敏政和明代中期徽州宗族政治	1
李 峤/译 孟凡胜/校	
杜勇涛 跨地域宗族与故土情怀:以清代苏州潘氏为例	32
李 峤/译 孟凡胜/校	
铃木博之 清代徽州府的宗族和村落——歙县的江村	66
王永东/译	
中岛乐章 清代徽州的山林经营、纷争、宗族形成——祁门凌氏文书的研究	98
顾 盼/译	
洪性鸠 清代徽州宗族与保甲制的展开	146
宋文静/译	
金仙憾 明代徽州宗族制的发展与诉讼现象	170
宋文静/译	



家族地位与民间祭拜：程敏政 和明代中期徽州宗族政治

郭琦涛

李 峤 译 孟凡胜 校

本文主要探讨明代中期(1450—1550)徽州宗族精英的权力诉求方式。中国封建时代后期,徽州府(今皖南)豪门云集,举国闻名。这些大族多是宋代之前从北方南下的贵族。宋代以降,他们中陆续涌现大量文人学士、达官贵人,从而诞生了中国封建时代晚期烜赫一时的徽商集团。宗族组织联通当地乃至全国的社会关系,以宗族为主要形式的四通八达的社会关系对徽州人仕途通达和雄霸商界至关重要。16世纪,这种宗族集团的发展模式极大地有助于徽州人加强宗族纽带,进行大规模宗族重建^①。然而这些徽州大族如何运作以保持他们内部的平衡,至今仍缺乏深入研究。本文利用之前鲜有使用的档案材料揭示士绅阶层如何编写宗族家谱、如何描述祭拜祖先——因为家谱和祭拜是宗族的重要活动,反映并服务于当地大族间的利益均衡。

徽州(新安)编印了包括当地不同姓氏的各个大族(含分布广

^① 参见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 Zurndorfer,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Local History*; Qitao Guo, *Ritual Opera and Merchant Lineage*。

泛的宗族分支)的家谱会通,这在明代绝无仅有。最早的《新安大族志》是为了纪念元代大儒陈栎(1251—1334)^①。笔者在阅读各个姓氏不同来源的家谱时发现,在编写“大族志”之初,编者并无印刷出版之意,这种情况到明代中期出现变化。明代徽州著名官宦大儒程敏政(1444—1499)以光宗耀祖为己任,积极推动并促成大族志的编撰和刊印。程敏政为提升祖上和程氏宗族地位,亲力亲为,重新编写家谱,编撰徽州大族志。此部《新安大族志》置程氏于徽州大族之首,这个排序后来一直被沿用。然而新近发现的一部极有价值的有关明代礼仪的记载《祈神奏格》使程氏的至尊地位大大下降。《奏格》记载了当地“万神庙”复杂恢弘的仪式程序。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部《奏格》也由程敏政编著。书中的仪式主体是以汪华为代表的“万神”——也即徽州各大望族。汪华是7世纪著名政治家,被尊为汪氏宗族的始祖。汪氏人口众多,在徽州赫赫有名。直到12世纪早期,这部“万神庙”礼仪记载流传广泛,记录当地受人尊敬的众多神仙英雄,包括程氏的著名祖先程灵洗(514—568),他们均以汪华为首^②。本文重点探讨程敏政如何利用自己的名声和影响力强化汪华的神圣地位,达到徽州大族间的利益平衡。

接下来的叙述将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徽州宗族事务和上层文化、下层文化如何互相渗透。中国宗族以庆祝宗族团结、亲属团圆,寻求共同祖先为最显著特色^③。众所周知,儒家的祖先崇拜是中国宗

① 此处为家谱汇总,而明清时代大多数家谱是一家一谱。明清时代宗族各自编写自己的家谱,也不同于宋代之前官方在全国范围采集各姓氏信息供官方使用。有关唐代姓氏的采集登记,参见 Johnson, *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

② 有关汪华等地方名流的详细论述,参见 Qitao Guo, *Exorcism and Money*。

③ Ebrey & Watson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pp. 1-13.

族文化的核心，本文从另一视角揭示名门大族与祖先崇拜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在当地士绅阶层的社会文化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①。本文重点不在仪式本身，而在于它们如何成为宗族之间用以争取地位、笼络关系的手段。当年的宗族精英们善于利用理学学者大儒的声望为徽州增色添彩，正如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将祖先神化、合法化。

本案例研究也试图揭示明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不断变化。正如卜正民指出的，明代中期，国家的社会作用日渐衰弱，取而代之的地方士绅阶层日益活跃^②。包弼德将这个新趋势恰当地称为“本土化趋势”。他的金华县个案研究显示，地方士绅阶层认为他们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符合国家集体利益，因而合情合理^③。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维度揭示明代中期本土意识觉醒过程中的内部权力抗衡，揭示地方宗族势力壮大与维护国家利益未必相悖。实际上，中央势力和地方势力总是相生相伴，相互影响。中央结盟不仅确保地方势力稳固，同时地方势力对文化资源的争夺强化了士绅宗族间的“和谐”功能，两者合力使徽州地区成为全国政治商业的中心，并在封建社会后期获得国家的大力扶持。

详细记录以上动态变化的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程敏政^④。

① 有关精英文化与地方祭拜，参见 Qitao Guo, *Exorcism and Money with Ritual Opera and Merchant Lineage*, 以及 Szonyi, *Practicing Kinship*; Timothy Brook 在 *Praying for Power* 中论述了佛教对士绅社会稳定性的贡献。

②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③ Bol, *The “Localist Turn” and “Local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④ 这是对这位明代伟人传记历史的早期涉足。本人的研究方法以一种新趋势不谋而合，就是以微观方法研究宏观史学中的重要人物。有关程敏政的研究也可参见 Wilson, *Genealogy of the Way* 和 Jay, *Memoirs and Official Accounts*。

黄 墩

1478年，在京为官十三年之后，程敏政获得机会回到祖籍地——徽州休宁县陪郭村。这位翰林院编修拜访了位于徽州府歙县的黄墩，参拜了祭祀祖先程灵洗的主殿，并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几处展示这位神圣的徽州祖先的古代遗迹。古迹共十二处，敏政为每一处题诗一首并将诗稿分发给族人亲属。接着敏政进一步考证黄墩历史，发现先祖程灵洗“本居休宁篁墩”，其地后割于歙^①。

程敏政认为篁墩所属的辖区和名字本身都值得进一步推敲考证。在一篇名为《篁墩书舍记》中，他写道：“程之先望北方，至元谭者从晋南渡，守新安……”敏政接着写道，“有治迹，受代为民所请留，蒙赐第郡之黄墩，子孙因留居焉。”元谭第十二代孙程灵洗骁勇善战，曾带领勇士平息侯景祸乱（548—552），成功保卫新安。百姓感恩戴德，在黄墩建庙以示纪念。“故凡新安之程，皆祖太守，宗忠壮，且号黄墩程氏。予家亦出黄墩。”阐明宗族身世之后，敏政试图解释黄墩地名给他带来的困惑。他写道：

考诸谱及郡志，莫知墩之所以名者。近得一说云，黄墩之“黄”本为“篁”字，以其地多产竹故名。至黄巢之乱，所过无噍类，独以黄为己姓，凡州里山川以黄名者辄敛兵不犯，程之避地于此者因更黄以求免祸。岁久而习焉，予独慨夫循吏忠臣赐第庙食之所，而污于僭乱之姓七百余年，卒无觉其非者，因大书“篁

^①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1252，第169页；卷1252，第389页；卷1253，第462—463页。
《休宁志》卷36，第26a—28a页。

墩”二字揭诸故庐……使后世知此地之获复旧名自予始云。^①

此后敏政自号“篁墩居士”“篁墩老人”。敏政对此举颇为得意，回京后立刻将篁墩的故事在同僚中广而告之，并请同僚撰文纪念。一大批达官硕儒，包括丘濬（1420—1495）和彭华（1432—1496）纷纷热烈响应，撰文以告世人，篁墩从此正名^②。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士大夫常常撰文作诗，进行“考据考证”，他们尤其热衷于考证和自己家乡祖先有关的事件和地名。程敏政考证黄（篁）墩，绝不仅仅是士大夫的消遣娱乐。士大夫自取新号往往表明他的新志向。敏政以“篁墩”自号，表明他立志提升徽州程氏宗族的地位。将篁墩之事广而告之，周知同僚自家的故土先祖，程敏政为提升徽州程氏宗族地位，不惜动用其官场影响力，但为何他单单选中篁墩呢？

篁墩对徽州而言，意味深长。已经有好几家名门望族声称徽州是他们的先祖故地。其中历史最久的是黄氏宗族。民间传说，东晋早年第一位皇帝（317—322年在位）就封黄家祖上黄积为新安太守。黄积去世后，葬在姚家墩。黄家后人从此定居姚家墩，并以自家姓氏改名为黄墩^③。程敏政在为黄氏家谱所作的序言中提及，黄氏最初定居姚家墩，但刻意避而不谈黄墩^④。似乎黄积来新安稍早于程元谭，根据1298年的一块墓碑，319年程元谭任新安太守，322年在此去世。而“黄墩”这个名字本身更是黄氏宗族为当地第一族的有力证明^⑤。实

① 《篁墩文集》卷1252，第229—230页。

② 《篁墩文集》卷1252，第512页；程尚宽：《新安名族志》，第1b—2a页；《休宁志》卷19，第32a—33b页；卷36，第23b—25b页；彭华：《彭文思公文集》，第332—336页。丘浚和彭华都是翰林院大学士。

③ 《新安名族志》，第73a页。

④ 《篁墩文集》卷1252，第601—603页。

⑤ 文字见于程敏政《程氏贻范集》卷1，第8a—10a页；程敏政：《新安文献志》，第954—955页。

际上,究竟哪个宗族最先在黄墩落户,比起如程敏政之类声名鹊起的后人的影响力显得并不重要。但是对程敏政而言,淡化黄氏为黄墩第一族的历史,是为确立程氏为黄墩第一族扫清障碍。

事实上,在徽州比黄氏更有竞争力的是汪氏。在为汪氏家谱所作的序言中,程敏政也不得不承认,“徽郡唯汪氏最著,族最多,故昔人有十姓九汪之谚”^①。徽州汪氏祖先汪文和,早在197年就渡过长江,定居新安,不仅早于程元谭,也早于黄积。程敏政重新释义黄墩,并质疑家谱记载的可靠性,意在弱化汪氏的地位。因为尽管汪氏是徽州最早的定居者,但在黄墩立有分支,则是在唐代早期,比程氏和黄氏晚好几百年^②。到敏政这代,徽州汪氏都自称是汪文和的唐代后裔汪华之后,汪华是隋唐之交称霸一方的枭雄。唐代早年,汪华去世后不久,就被供奉在宗族祠堂,比程灵洗到宋代才被宗族供奉早了很多年^③。了解这些历史背景,黄墩之行中,程敏政特别关注供奉程灵洗的主殿和四周传说中的遗迹。深思熟虑之后,他采取重新释义,突出黄墩的方法,成功地将人们的视线转向程氏先祖,使之可以与已经被神话的汪华抗衡。

实际上,程敏政试图提升自己宗族的声望,以盖过其他宗族的种种手段在徽州大族竞争中并不罕见。最常见的做法是声称自己源于某个显赫的祖先,并且尽可能将时间推至越久远越好。程敏政的京城同僚李东阳(1447—1516)在1488年为休宁汪氏家谱作序中甚至附和汪氏,声称汪氏是传说中黄帝的后裔^④。而程氏宗族也自称过黄

① 《篁墩文集》卷1252,第473页。

② 《新安汪氏重修八公谱》;《新安名族志》,第88a页。程敏政为汪氏家谱作序,称汪文和为“新安之首”,《篁墩文集》卷1252,第473—474页。

③ 《新安名族志》,第94b页;《程氏貽范集》,第1223朝廷颁奖令,卷1,第8a页。

④ 李所作序言参见汪尚和:《休宁西门汪氏族谱》卷1,第6b页。

帝后裔^①。程敏政将祖先追溯到周代一个显赫的大人物，尽管不是黄帝本人^②。这位家谱撰写者，不仅声名显赫，而且富于创新^③。他明白，撰写家谱至关重要，宗族起源必须令人信服^④。他对篁墩的释义看似考据准确，无可辩驳地让人相信，程氏在篁墩乃至徽州是历史最悠远的宗族，比黄氏和汪氏更为古老。

至少从一个知名的局外人看来，程敏政的“篁墩”考证起了作用。1480年，在热烈回应篁墩考证之后不久，翰林院丘浚为休宁汪氏分支新修订的家谱作序。序言本是为汪氏歌功颂德，但丘浚却将程灵洗与汪华相提并论。他这样写道：“惟程汪二族在新安独著焉。二姓之先（灵洗与汪华）皆生为英杰，死而庙食于其乡，数百年犹一日也。”^⑤

但是在黄墩，仅凭悠久的历史还不足以确立宗族的独尊地位。众所周知，最为徽州增光添色的是理学的学者大儒们。最著名的是儒学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这位理学大师虽然出生于福建，但是将黄墩视为故土。在写给徽州府婺源县亲属的文中，朱熹特意提到，“吾家先世居歙州歙县之黄墩”^⑥。

对徽州程氏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朱熹的黄墩渊源与程氏密切相关：朱熹公开承认师承“二程”：程颐（1033—1107）和程颢（1032—1085）。徽州程氏自称他们和程颢、程颐同属程灵洗后人。程敏政将

① 戴廷明、程尚宽：《新安名族志》，第18页。

② 参见为程敏政《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所作的序言。

③ 这种将家谱图解扩大到全部亲属的做法对程敏政之后的家谱编撰影响重大。参见 Qitao Guo, *Ritual Opera and Merchant Lineage*, p. 24。

④ 不少徽州所谓祖上显赫多为杜撰。但是神话辅以流传广泛的“事实”却增加了材料的可信度。中国传统社会晚期，这类似是而非的宗族故事由于代代相传而流传广泛，最终被当作历史事实。这些私人家谱在宗族内外都有流传，实际上提升了徽州的名声。参见贺杰：《父系亲属和本土化宗族的发展：徽州休宁吴氏》，第148—149页。

⑤ 参见汪道潜《汪氏族谱》序言部分。

⑥ 《新安文献志》，第426—427页；赵滂：《程朱阙里志》卷3，第33a页。



他的宗族和程朱大儒成功地联系起来。经过长时间的不断努力,这种联系最终在明代末年得以稳固,至此二程和黄墩的渊源不仅关乎程氏宗族,而且关乎整个徽州的荣耀。万历年间(1573—1620),十三位歙县士绅联合编写了一部八大册的《程朱阙里志》,详细描述黄墩历来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书中枚举了二程兄弟、朱熹和新安的种种社会历史渊源。第一卷“人杰地灵之圣地”的简介中,编者不无自豪地突出篁墩与“程朱三夫子”的双重纽带,此时“篁墩”已经成功代替了“黄墩”。这一卷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名为《篁墩》,之后附有与程灵洗有关的十二处古代遗迹中六处的详细叙述,当年程敏政为这些古迹挥毫赋诗,书中还附有与朱熹有关的著名景观:如篁墩的“朱家巷”和婺源“彩虹井”^①。篁墩与古代名人的渊源使徽州成为休宁士绅引以为荣的“程朱阙里”。

至此“篁墩”已成为徽州大族集体记忆中引以为荣的文化中心^②。程敏政清楚地看到“篁墩”这个名字承载的丰富内涵与文化象征,因此自号“篁墩居士”。以“篁墩”自号,表明“篁墩居士”重写历史、提升宗族名望的决心。而程敏政重写历史也促使其他徽州大族纷纷效仿,客观上反而削弱了程敏政提升程氏名望的初衷。为了进一步探究徽州大族的利益博弈,我们先从程敏政的视角考察当地的宗族政治。

大儒之乡篁墩

程敏政是重写明代中期徽州历史的不二人选。这位“篁墩居士”

① 《程朱阙里志》卷1,第1b—6a页。“彩虹井”的故事讲述朱熹的父亲出生时,一道白色彩虹从井里升起,到朱熹出生时,井里又升起紫色彩虹(卷1,第6a页)。

② 有关神圣场所的象征意义,参见Meye-Fong,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出身名门望族，功成名就，交游广泛，因此十分自负。他决心利用自己的才华和名望重写历史，让徽州程氏大放异彩。在他眼中，徽州、陪郭村和程氏宗族是一道异常美丽的风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观念始终贯穿程敏政重写历史的整个过程，尽管日后备受非议，这部家谱不失为记录徽州辉煌的珍贵史料。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篁墩居士”这个名字后来引发徽州史的再次重写，结果却和“篁墩居士”的初衷大为相悖。大族间的利益争夺和互相倾轧最终导致其利益达到相对均衡，尤其是两大望族：程氏和汪氏。

妨碍程敏政自封程氏为徽州第一族的主要障碍是他自己的身世。程既不生于徽州，也不长在徽州，然而这并没有阻挡他前进的步伐。程敏政的嫡系祖先早在明代初期便从徽州移居河间府，即现在的河北省。他的父亲程信（1417—1479）在那里长大成人^①。1442年程信考中进士，之后仕途通达，在各省乃至京城（北京和南京）为官，曾任兵部尚书等要职^②。在四川任职时，程信将儿子引见给巡抚罗绮，罗赞叹这位少年英才，遂将年仅十岁的神童程敏政引荐给英宗皇帝，皇上施恩，准许程敏政入翰林院深造。大学士李贤、彭时尤其厚爱敏政，李贤甚至后来将女儿嫁给他。有了与上层人物四通八达的关系，1466年，年仅22岁的青年才俊程敏政进士及第，夺得榜眼^③。

然而仕途光明、前程似锦的程敏政却似乎高处不胜寒。尽管此时他已经官至礼部右侍郎，专门侍奉皇太子讲读。但是才高自负的性格让程敏政招致一些同僚的厌恶。1488年，敏政被弹劾失去官职，他回故乡陪郭村隐居五年^④。之后官复原职，但好景不长，1499

① 程敏政：《休宁陪郭程氏本宗谱》，第16a、38a、46a页。

② 《明史》，第4593—4595页。

③ 《明史》，第7343—7344页，雷礼：《国朝列卿记》，第1053—1068页。

④ 中国传统社会晚期官员常常遭弹劾，一生仕途起伏不定，被弹劾再复职的遭遇，人均大约有五次之多。参见 Rowe, *Saving the World*, Ch. 2.

年,敏政不幸卷入科场舞弊丑闻。作为主考官之一的敏政被指控向两位考生泄漏考题。尽管后来证明这是一场冤案,但被诬入狱的程敏政悲愤交加,出狱不久就含恨辞世。去世后朝廷追封礼部尚书^①。

事实上,敏政的仕途之路并不坦荡,并最终以悲剧收场。真正为他赢得声望的是其学术造诣。当年在人才济济的翰林院,就流传着“学问赅博称敏政”的说法^②。程敏政名副其实,身后留下大量著作文章。著名的包括诗集两部、注解儒学的著作两部,他还编著了两部大型历史文献:《明文衡》和《新安文献志》。

其中百卷巨制《新安文献志》尤其重要。它涵盖了从程灵洗到15世纪晚期徽州名流的代表作或著名言论并附个人简介。和篁墩之行目的相同,这部文献旨在突出程氏祖先,将程氏祖排在徽州名士之首。敏政在序言中强调休宁和程颢、程颐的渊源,在正文中则突出朱熹和徽州的关系,如此一来顺理成章地将徽州“程朱阙里”的地位稳固下来^③。在将徽州推向全国的过程中,《新安文献志》刻意突出程氏宗族的名流达人。至此程敏政的计划起到预期效果,他已经成功地将宗族利益和徽州荣耀合为一体^④。

敏政的大多数著作文章和《新安文献志》相同,包括其鸿篇巨制《篁墩文集》,都关注徽州人物事件。程敏政积极关注的另一件大事是编写程氏族谱。正如他在1482年所说,“初敏政最留心谱学”^⑤。研究的结果是同年编成《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及其姊妹篇《程氏贻范

① 《明史》,第7343—7344页。有关考试丑闻,参见《国朝列卿记》,第2597—2598页,夏燮:《明通鉴》,第1061—1063页。

② 《明史》,第7343页。

③ 《新安文献志》前言,第1页。

④ 整体上说,程敏政涵纳了更多程氏宗族的文献,远远超过其他姓氏。在《新安文献志》中所引著者中,程氏61位,汪氏51位。程敏政的“宗族霸权”遭到后来徽州士绅的批评。参见许承尧:《歙事闲谭》,第859—860页。

⑤ 程敏政为《程氏贻范集》所作序言。